

日据时期台湾留日
学生与战后台湾政治

李跃乾 著

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丛书

台湾研究

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丛书

李跃乾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与战后台湾政治 / 李跃乾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108 - 0911 - 8

I. ①日… II. ①李… III. ①政治 - 研究 - 台湾省②
留学生教育 - 研究 - 台湾省 IV. ①D675. 8②G648. 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3151 号

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与战后台湾政治

作 者	李跃乾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
电子信箱	jiuzhou@ jiuzhoupress. 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
印 张	22
字 数	33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8 - 0911 - 8
定 价	55. 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和目的	(1)
第二节 研究对象和方法	(3)
第三节 研究创新和局限	(22)
第一章 台湾光复前后的留日学生	(24)
第一节 光复前后留日学生活动概况	(24)
第二节 留日学生在台湾光复前后活跃的原因	(57)
第二章 留日学生与二二八事件	(69)
第一节 事变前留日学生领导的活动	(70)
第二节 事变中留日学生领导的活动	(83)
第三节 事变后的留日学生	(99)
第三章 留日学生与战后“台独”运动	(112)
第一节 留日学生“台独”活动概况	(113)
第二节 留日学生的所谓“台独”理论及其危害	(125)
第三节 留日学生领导或参加“台独”的原因	(130)
第四章 两蒋统治时期留日学生参加的重要选举	(138)
第一节 光复初留日学生与县市以上民意机构选举	(139)
第二节 留日学生当选省议员和县市长概况	(146)
第三节 留日学生选举战略策略分析	(148)

第五章 留日学生与政党轮替	(172)
第一节 留日学生与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组党运动	(173)
第二节 李登辉对政党轮替的重大影响	(183)
结 论	(190)
附 录 部分台湾留日学生小传	(196)
参考文献	(338)
后 记	(347)

导 论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和目的

一、研究背景

2004年，我练笔写作李登辉传记时，发现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可以说既是政治之谜也是历史之谜。早在1993年前后，李登辉就大谈“生为台湾人的悲哀”，并声称国民党政权是所谓“外来政权”，“台独”分子的真面目基本暴露。1996年3月，尽管遭到了大陆的猛烈批判，李登辉仍然能以比较高的票当选首届所谓“民选总统”。2000年5月，李登辉领导12年的国民党丢掉了政权，虽然国民党内有大批人极力反对他，但对他12年执政情况表示满意的民众仍接近六成。^①这说明李登辉在岛内的统治基础不仅有国民党，还有另外的一些阶级、阶层或集团。在所谓国民党政权“本土化”或者说省籍矛盾问题上，李登辉是这些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代表人物，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随着阅读范围的拓宽和研究的深入，我发现李登辉的成功与他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密不可分。在台湾的近现代史上，台湾的留日学生是个极其重要的社会阶层，或者叫社会阶级，影响十分巨大。日据时期50年间，大约有20万台湾青少年留学日本，当时叫“到内地求学”。其中有6万人左右受到大专以上教育。他们是台湾社会的精英或者说是领导阶层，对台湾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都有根本性的影响。在政治上，二十世纪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力量常常来自海外留学知识分子。台湾留日学生在日据时期也是反日本殖民统治运动中的领导力量。在这场运动中，林献

^① 台北，《中国时报》，2000年3月25日，第一版。

堂、蔡惠如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是领袖，留日学生则是新生的中坚力量。

一些留日学生还回祖国大陆参加了抗战和光复台湾的伟大斗争。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湾人抗日团体，基本上都是由留日学生领导的。台湾光复后，留日学生积极参加新台湾的建设，在各个领域尤其在政治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留日学生中的极少数人，由于受到日本军国主义影响太深，走上了分裂祖国的“台独”道路，对战后直至今天的台湾政治都有很坏的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现实生活中留学西方的高潮，大陆学者开始重视研究 1896 年之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问题。留学，是世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化从过去走向今天的重要途径，也是世界文化从现在走向未来的重要媒介。留学，是中日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日关系从过去走向今天的重要渠道，也是中日关系从现在走向未来的桥梁。留学，曾给中国的社会变迁以重大影响，曾给中国的社会进步以重大推动。100 年里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运动，已经成了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当代史中的重要篇章。^① 尽管如此，但大陆学者却没有去注意研究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的问题，不知道是因为当时台湾被日本霸占，还是因为缺乏研究资料。

蒋介石父子统治台湾时期，台湾历史文化研究受到一定的限制，研究范围限于右翼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即属于国民党和台湾民族运动中右派的留日学生的抗日活动。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随着中国大陆“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和台湾经济的繁荣，台湾研究在岛内外逐渐成了显学，加上岛内舆论的开放，有关日据时期留日学生的资料大量出现，大批涉及留日学生的口述历史、回忆录、文集、传记、地方志和研究论著出版，这为留日学生这个社会阶层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岛内主流学者却受到了“台独”意识形态的和研究方法的影响，研究不够客观和宏观。他们仍然对日据时期留日学生进行单个的研究；而不当作一个社会阶层进行整体的研究。

在导师林仁川先生的指导下，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历史所周翔鹤、邓孔昭、李祖基、陈小冲等老师的帮助下，我选择了这个重要而又无人专题研究的课题作为我的博士毕业论文。

① 沈殿成著：《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1896—1996》（上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1 页。

二、研究目标

全面梳理日据时期留日学生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的历史资料，为以后全面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础；运用社会阶层和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日据时期留日学生这个社会阶层在战后台湾政坛上的活动状况、活动规律和影响力，揭示日本政治文化对战后台湾政治的影响状况，从而发现台湾现代政治历史的规律，为祖国统一大业提供历史的借鉴。

第二节 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其特点

本书所研究的是日据时期（1895—1945）留日学生与战后台湾政治的关系。日据时期的留日学生包括小学生、中学生、职业学校学生、大专院校学生、军校生、函授生等等，只要是在日本各级各类学校学习一年以上或者接受日本大学函授教育者，都属本文研究对象。按照社会学上的社会阶层理论，凡是有相似的社会资源的团体都可以称为社会阶层，不论其共享的社会资源是哪一种。留日学生共同享受的社会资源是日本的学校教育，因而可以作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来加以研究。在教育问题上，台湾和大陆完全一样，十分重视。早在明朝台湾就引进了科举制度，有功名的读书人享受很高的社会地位。^① 所以留日学生也是如此，是社会领导阶层或精英阶层，也可以称为享受很高社会荣誉的“地位团体”。

台湾青少年大量去日本留学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殖民者的教育歧视政策和台湾经济的发展。“1918年前，因公学校扩充缓慢，儿童入学率低（15.7%），中等以上教育机关更不完备，有志青年不得不去日本读书。”^② 因经济的发展，台湾人民产生了对教育和技术方面的要求，才有1919年新《教育法》的修订。^③ 事实上新的《教育法》，仍不能满足台湾人民的需求，

① 林仁川著：《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上海，文汇出版社，1991年，第204页。

②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重修台湾省通志》卷六，台北，1993年，第156页。

③ [日] 矢内原忠雄著：《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1964年，第108页。

台湾学校还是只偏重日文的训练，而疏于知识的传授，再加上学校的收容力有限，于是台湾青少年纷纷渡海求学。

台湾人到日本留学还有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日本的近代教育模式比旧中国的教育模式先进。例如，日本创办东京帝国大学在 1877 年，而中国创建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是 1902 年，相差 25 年；日本公布欧美式近代化的新学制为 1872 年，而中国废科举兴学堂为 1905 年，相差 33 年。1896 年以后，中国大陆也兴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① 这对台湾人选择学习的地方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最早到日本留学的是 1895 年 12 月去日本明治大学普通科就读的周福全，次年春又有富豪兼著名绅士李春生的几个孙子去日本读中小学。在他们之后，留学日本的人数逐年增加，规模越来越大。

“光绪三十三年，留日学生仅 63 人，民国六年增至 264 人，民国七年已达 493 人，且逐年增加。”^② 1922 年已高达 2400 人左右。台湾女性留学日本始自 1906 年，到 1930 年代才逐渐增多。^③ 留学日本的台湾人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富家子弟，他们的父兄不满于日人在台湾的教育制度，自年少的时候就送去东京入小学校，如雾峰、板桥的林家及高雄陈家的子弟莫不如此。第二种是在台湾的最高学府毕业，为着深造而赴日本留学的。……最后一种是不能考入医专和国语学校的‘狭门’，无法升学才跑到东京去的，这类居日本留学生的最大多数。”^④

“几乎所有学者一致认为，教育是影响个人政治文化取向最具关键性的因素。”留日学生这个社会阶层有受过良好教育者的一般特点，即“不仅消息较通达和表达能力较流畅，他们对时间亦有不同的感觉，对个人和社会效能有强烈的意识。他们较积极地参与社区事务，对新观念、新经验和新人物，持开放的态度，他们较重视科学、较容易接受变迁。总之，他们的人格

① 沈殿成著：《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1896—1996》（上册），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20 页。

② 台湾总督府文教局编：《台湾总督府学事年报》，1907 年、1912 年、1918 年。

③ 游鉴明：《日治时期台湾学校女子体育的发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0 年，第 47 页。

④ 叶荣钟著、李南衡编：《台湾人物群像》，台北，帕米尔书店，1985 年，第 237 页。

特征变为更现代化。”^① 他们收入高、影响力更大。他们有着与大众不同的政治态度。除此之外，由于有着被日本殖民统治的共同经历，留日学生这个社会阶层还有其本身的一些共同特征：

（一）留日学生这个社会阶层具有雄厚的经济资本。由于留学日本花费巨大，故留日学生一般要有富裕的家庭。他们大多出身于地主、商人或官绅家庭，能负担留学费用。当然，也有极少数出身贫困家庭的人去日本留学，但得到了大地主大资本家或者教会的资助。例如，林献堂资助甘得中、叶荣钟等几十个有志青年留日；基督教教会则资助林茂生、高俊明等教会家庭的子女留日。留学之后，无论留在日本还是回台湾，留日学生能够谋到收入较高的职业，如医生、官吏、教师、记者、工程师、公司职员等等，有的则运用新式技术和经营理念经营工商业或农场。总之，他们有能力保持本阶层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

（二）留日学生这个社会阶层具有优越的可再生的文化资本，这是留日学生能够成为台湾社会领导阶层的最重要的资本。留日学生在日本接受了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在经济、文化、科技、政治等各领域都起到带头作用。因而他们本身也有很强的优越感。如前文所述，因为日本近代教育模式远远比旧中国先进，所以留日学生特别是留学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东京商科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的比较自负。“日本的高等学校及帝国大学模仿德国的制度，所以我们都有自负心理。光复初年，有人要把我的论文送到美国某大学去申请学位，我严词拒绝了，因为我觉得自日本高等学校、帝国大学毕业的程度比美国高，对美国的学位授予很轻视。”^②

（三）留日学生在日本和台湾都有比较丰厚的社会关系资本。留日学生在日本留学、工作、生活多年，极少数人甚至做官多年，他们在日本有许多同学、同事、老师、上司、朋友、姻亲等，这些都是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资本。留日学生一般出身望族，在台湾也有丰厚的社会关系资本。这对台湾政治和近百年的日台关系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① 赵永茂著：《台湾地方政治的变迁与特质》，台北，月旦出版社，1996年，第13页。

② 卓遵宏、林秋敏访问记录：《林衡道先生访谈录》，台北，“国史馆”，1996年，第164页。

（四）留日学生这个社会阶层比较深地受到了近现代日本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则知之甚少。日本政治文化因而通过他们影响了台湾的近现代政治。

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东西。政治文化也可分为制度体制和思想观念两个大的方面。制度体制包括政府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官僚选拔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等等；思想观念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指导方针、政治思潮、治国纲领、建设计划、官场习气、官僚作风等等。战前日本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在政治制度上，1889年颁布资产阶级性质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日本是个君主立宪国家，在政治体制上是天皇制、政党内阁、文官官僚体系三者并存的，天皇是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政党控制国会，作为精英的文官官僚则控制着行政。人民有一定程度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著述出版自由，1870年就开始有争取民选议会、民定宪法的自由民权运动。在政治观念上，信奉国家神道^①、大和魂、实用主义、金权政治、军国主义等等，有“和魂洋才”、“脱亚入欧”等影响深远的立国建国方针，大量引进社会主义、自由民权、无政府主义、民本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西方近代政治思潮，积极学习欧美先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治国路线。官僚则比较守法奉公、负责尽职、廉洁自律、讲究行政效率，等等。

战后日本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则是，在美国占领军的控制指导下，颁布《日本国宪法》，在天皇制下建立民主的政党政治制度，政党内部则继续保留战前的“派阀”林立的传统，所谓“派阀”就是家族式的政治派系。人民有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著述出版等自由。在政治观念上则信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金权政治等，也保留着一些神权政治的残余。

近现代日本政治文化的一些具体内容和特点，以及它们对台湾留日学生和日据时期台湾政治的巨大影响，概括介绍如下：

1. 1885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了著名的“脱亚入欧”观点。在此方针指导下，日本的政、学两界热衷于研究和引进近代西方的各种政治思

^① 国家神道：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同国家权力相结合，被赋予特权。它宣传以日本为中心的“神国”思想，称天皇是“现人神”，是万世一系的神圣统治者，是军国主义精神支柱之一，1945年12月被禁止为国教。

潮、政治制度。因此，留日学生也在日本通过日本语言文字接受了近代西方政治思潮，了解了立宪政体等近代西方政治制度。

日本自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主要关心欧美各国，但对亚洲邻国没有持续性的高度关注。这与明治以来，它希望“脱亚入欧”，吸收欧美技术、制度与学问，而尽量与“野蛮不文明”的亚洲诸国保持距离等基本思想有关。对亚洲各国的关心，主要出发点是因为各国政治上的不安定，或有第三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介入，使日本殖民地、势力范围或安全保障受到威胁。但直到 1995 年，日本的政、学界都不认为亚洲各国在经济和政治发展上有学习和研究的价值。^① 例如，东京大学法学部有个百年历史的学会就叫“国家学会”（日本把政治学叫“国家学”），致力于研究西洋政治制度和思想，并将它介绍到日本。西洋国家的外交、战争、政治体制和经验，成为日本政治学的主题。

在日本引进或介绍的西方近代政治思潮中，对留日学生影响深远的有自由民权、马列主义、民族自决、民主主义（日本叫民本主义）、无政府主义等。

19 世纪末开始，在日本宣传社会主义的有堺利彦、山川均、荒佃胜三、幸德秋水、片山潜、河上肇等著名人物。例如，山川均主张采取缓和路线，著有《殖民地政策下的台湾》。1910 年代开始，河上肇就在东京帝大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于 1907 年创办《日本经济杂志》，后来还创办《社会问题研究》杂志，宣传马克思主义。他著有《资本主义经济学史的发展》、《第二贫乏物语》、《资本论入门》。1920 年代社会主义思想风靡日本，1926 年社会主义人民党和日本农工党相继成立，日本共产党也重建。这吸引了许多台湾留日学生。^② 1927—1945 年间在日本留学的林衡道回忆说，其父反对他上有马克思经济学传统的京都帝国大学，他才选上仙台东北帝国大学。但东北帝大也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国家论”。早稻田大学也素有“社会主义

① [日] 猪口孝著：《写给中文版序》，猪口孝著，赖郁君译：《日本经济大国的政治运作》，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 年。

② [日] 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三册第二章，《社会主义》，第 640 页。

大本营”之称。^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十四条和平原则，倡导民族自决权。民族自身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②这对身受日本殖民压迫和歧视的台湾留日学生影响最大。

1910年代的日本民本主义运动。东京帝大政治学教授吉野作造甚是服膺西方的民主制度，在1916年1月的《中央杂志》上发表《论宪政本质并论其成功之道》，盛倡民本主义。DEMOCRACY一词应译作“民主主义”，吉野因顾虑日本的国体是君主立宪制，和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不能两立，所以把它翻译成“民本主义”。日本知识分子非常欢迎。1920年吉野作造和东京商大教授福田德三合组“黎明会”，鼓吹民本主义。民本主义乃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主流，很快地就风行全日本。^③

在上述西方进步思潮影响下，在祖国大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鼓舞下，在1919年爱尔兰独立运动和朝鲜“万岁事件”的刺激下，留日学生的汉民族意识觉醒，乃积极进行非暴力的抗日活动。他们组织“应声会”、“启发会”、“新民会”、“东京台湾青年会”、“文运革新会”、“东宁学会”等民族民主运动团体。他们积极参加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参与组建“台湾文化协会”，参与组建“台湾民众党”和“台湾地方自治联盟”。

1919年秋在东京成立的“应声会”，是林呈禄、蔡培火、彭英华和中國大陸留日学生马伯援、吴有容等组织的，但很快消散。比它稍后成立的“启发会”，成员有蔡式穀、林呈禄、蔡培火、郑松筠、罗万侔、蔡玉麟、谢溪秋、谢星楼、彭英华、林仲澍、黄呈聪、黄周、吴三连、王金海、黄登洲、吕磐石、吕灵石、陈崐树、刘明朝、庄垂胜、林攀龙等，但该会有思想无主义，也无经费，不久也归于无形。

“新民会”于1920年1月11日在东京成立，以林献堂为会长，吸收了全体启发会成员，另有会员蔡先於、陈全永、李乌棕、林济川、林石树、林朝廷、郭国基、颜春风、吴清水、陈添印、黄成旺、陈福全、王敏川、林仲

① 卓遵宏、林秋敏访问记录：《林衡道先生访谈录》，台北，“国史馆”，1996年，150页。

② 蔡培火：《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台北，《台湾文献》，第24卷3期，第175页。

③ 梁惠锦：《台湾近代民族运动的背景》，台北，《台湾文献》，第24卷3期，第229页。

辉、施至善、吴衡秋、苏维樑、吴镜庭、蔡珍曜、蔡伯汾、林伯旻、柯文质、蔡敦曜、陈炘、王江汉、谢春木等。该会宗旨是站在民族自决主义立场上，用合法手段谋求台湾的民权，对台湾人民进行启蒙活动。它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和创办了《台湾青年》。后来又有许多留日学生加入“新民会”，重要的如杨肇嘉、吕阿墉、叶荣钟、高天成、朱昭阳、黄及时、张梗、陈茂源、陈金能、张大端、陈朝景等。上百名普通会员都是留日学生。为了替《台湾青年》拉稿和寻求政治上的支持，留日学生乃积极和日本政、学、新闻界的人士接触，并向其中的有识之士揭发台湾总督府的苛政。因此，组织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和创办《台湾青年》等重大政治活动，锻炼出一大批政治活动家^①。

《台湾青年》后改名《台湾》，为这两个刊物撰稿和编辑的留日学生有林呈禄、彭英华、罗万侖、黄朝琴、徐庆祥、吴三连、王敏川、蔡式毅、石焕长、刘明朝、黄呈聪、林仲澍、李瑞云、陈炘、林济川、蔡玉麟、蔡敦曜、刘青云、蔡先於、郭马西、陈岷树、颜春芳、蔡珍曜、吕灵石、林仲辉、涂火、林攀龙、林伯旻、杨维命、蔡伯汾、郑松筠、谢星楼、周桃源、郭国基、柯文质、张聘三、林万金、王金海、王江汉、蔡培火等。^② 这些人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有比较深的研究。

“东京台湾青年会”，创立于台湾留日学生寄宿的宿舍“高砂寮”。它最早的活动记录在1920年9月19日，留日学生五百人参加。主要政治活动有：举行大会声援遭受总督府压迫的《台湾青年》杂志，要求给台湾人以日本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在东京支援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组织文化演讲团，利用暑假返台到各地巡回演讲。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陈炘、吴三连、罗万侖、彭英华、吕灵石、谢春木、林仲辉、郭国基、黄周、连震东、温成龙、庄垂胜、张聘三、游弥坚、苏维樑、赖远辉、林九龙、吴春霖等。^③ 1927年4月，“东京台湾青年会”社会科学研究部在“高砂寮”成立，许乃昌、商满生、高天成、黄宗葵、林朝宗、杨云萍、周庆丰、曾霖泽、林春

① 吴三连等著：《台湾民族运动史》，台北，自立晚报社，1990年，第82-86页。

② 吴三连等著：《台湾民族运动史》，第548页。

③ 吴三连等著：《台湾民族运动史》，第88-94页。

木等三十多名留日学生参加，他们和日本共产党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该部先后改名为社会科学研究会和台湾学术研究会，重要成员后来还有陈来旺、林乙垣、林有财、林兑、萧来福、黄宗尧、陈铨生、林裳、苏新、何火炎、李清标、何瑞麟、陈逸松、吴新荣、黄百禄、庄守、郭华洲、郑昌言等。他们在台湾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指导下活动，主张通过发动工农群众的阶级斗争使台湾得到解放。1931年12月，林兑、叶秋木、赖通尧、吕江汉、张麗旭等人组织社会问题研究会，研究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等各种问题。^①

1930年前后，不少台湾留日学生加入日本共产党指导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他们是王白渊、林兑、张麗旭、吴坤煌、林衡权、张文环、翁廷森、张水蒼、吴逊龙、谢荣华等，主要进行文化宣传活动。^②

“文运革新会”，1925年11月在东京成立，会员40多人。该会强烈反对民族压迫和强权蔑视公理。“为图台湾民众之觉醒……乃集愤慨时弊的同志组织本会。”该会呼吁“破坏！破坏！奴隶养成所的一切学校，为喂肥压迫民族而建设的制糖会社、铁道、工厂等，一切的阻碍物应予破坏。现在是着手破坏的好时机，破坏，破坏！破坏啊！由破坏才能够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该会反对和平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由于态度激烈，该会很快就遭到总督府镇压。^③

“东宁学会”，又称“留东同乡会”，1926年10月在东京神田中国青年会馆成立，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留日学生参加。台湾留日学生有丘琮（丘念台）、郑昌英、陈尚文、翁瑞炎、翁瑞国、郑松筠、萧秀利等，主要是客家人。表面上以联谊、砥砺学问为目的，实际上致力于光复台湾的民族运动。^④

“台湾文化协会”，1921年10月17日在台北成立，领袖是蒋渭水和林献堂，以“助长台湾文化之发达为目的”，吸收大批留日学生参加。重要成

① 王诗琅译注：《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台北，稻乡出版社，1995年，第77-95页。

② 王诗琅译注：《台湾社会运动史——文化运动》，第96页。

③ 吴三连等著：《台湾民族运动史》，第95页。

④ 吴三连等著：《台湾民族运动史》，第97页。

员 47 人中有留日学生蔡培火、王敏川、杨肇嘉、林茂生等 20 人。文化协会主要活动是创刊《会报》、设置读报社、创办“美台团”电影放映团，举办各种讲习会、演讲会和夏季学校，对台湾民众进行汉民族意识和近代民主主义教育。^① 该会本是一个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统一战线组织，内部有社会主义派和民族主义派的对立。1927 年 1 月 3 日，在台中市召开的临时大会上，信奉社会主义的王敏川、林碧梧、张信义、庄孟侯、侯朝宗、王万得等左派青年夺取文化协会领导权，林献堂、蔡培火等民族主义派退出。“新文协”主张进行阶级斗争，“以普及大众之文化为主旨，实行本会之纲领决议宣言为目的，应予实行之纲领如左：一、向上农村文化。二、增进商工智识。三、涵养自治精神。四、奖励青年求学。五、提倡女权思想运动。……”1932 年 12 月，王敏川等“新文协”中央委员及重要会员十多人被日警逮捕，“新文协”最后被消灭。^②

1921 年 1 月开始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其理论和法律依据都是“大日本帝国乃立宪治国，今台湾为帝国统治之一部分，故在台湾统治上倘有需要设立特别制度，其范围亦须根据立宪政治之原则，此乃当然之理。”根据立宪政治原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应当分立。所以，林献堂等请愿者向日本帝国议会要求设立民选台湾议会，分取“六三法”授予台湾总督府的特别立法权。在第一次请愿书上签署的 178 人，除领衔人林献堂外，大部分为东京台湾留学生。到 1934 年为止，请愿活动共有 15 次，骨干力量一直是留日学生。其中著名者有蔡培火、林呈禄、林柏寿、黄呈聪、王敏川、郑松筠、吴三连、蔡式毅、吕灵石、吕磐石、杨肇嘉、邱德金、罗万侖、叶荣钟、庄垂胜、丁瑞图、陈金能、韩石泉、王钟麟、甘得中、陈炘、陈朔方、陈启川、黄朝清、杨基先、蔡先於、石焕长、石锡勋、张深镠、何景寮、郭发等。这场历时 15 年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由于日本殖民者的压迫而以失败告终。在请愿运动期间，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留日学生深入学习和研究日本的政治和法律，特别关注日本众议院议员及地方会议员选举，积极和日本朝野政治人物、新闻媒体接触，勇敢地举起“自由”、

① 第六章《台湾文化协会》，吴三连等著：《台湾民族运动史》，第 281 页。

② 第六章《台湾文化协会》，吴三连等著：《台湾民族运动史》，第 337—351 页。

“平等”的旗帜进行示威游行。^① 这场民族民主自觉运动，是台湾人民首次运用近代政治斗争方式争取自由，不仅启发了台湾人民反抗总督府专制统治的政治意识，而且强化了留日学生对日本政治文化的了解。

1927年7月10日正式成立的“台湾民众党”，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合法政党。领袖人物是蒋渭水、林献堂，但主体是留日学生蔡式毅、谢春木、蔡培火、王钟麟、陈炘、罗万侔、林呈禄、叶荣钟、简来成、杨连树、黄周、黄旺成、彭英华、吴淮水、林攀龙、林履信、刘明哲、何景寮、陈其昌、邱德金、庄垂胜、李友三、王甘棠、杨金虎、蔡炳煌、陈金波等人。其纲领“本党以确立民本政治，建设合理的经济组织及改除社会制度之缺陷为纲领”。所谓民本政治，就是要求立宪政治、反对总督府专制，使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台湾人享有参政权。1929年7月，日本民政党内阁成立，“台湾民众党”乃向它提出台湾政治改革建议书，列举改革要点：台湾实施完全地方自治制度；尊重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准许台湾人发行日刊新闻；实施义务教育制度；改革司法制度；设置行政裁判所；严禁鸦片吸食等等。这些都是日本已有的制度。该党反对日本侵华政策。1928年7月26日召开的中央常委会上，政治部主任王钟麟提出《对华政策反对声明》，电告日本各政党、报社，反对田中内阁破坏中国统一。^② 1931年2月，该党被日警取缔，蔡少庭、陈天顺等16个干部被捕。

“台湾地方自治联盟”，1930年8月17日在台中市正式成立，林献堂被推选为议长，重要干部也以留日学生为主：杨肇嘉、蔡培火、林履信、蔡式毅、刘明哲、李瑞云、李延旭、叶清耀、黄朝清、陈炘、林柏寿、罗万侔、韩石泉、何景寮、叶荣钟、高天成、陈朔方、陈茂堤、杨金虎等。该盟以“确立完全地方自治制”为唯一目标。该盟在全岛24个地方举行政治演讲会，演讲人也以留日学生为主，听众总共近2万人。在殖民政府高压下，1936年8月，该盟召开第四次全岛大会宣布解散。^③

2. 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政治文化中始终有一股逆流，

① 第四章《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吴三连等著：《台湾民族运动史》，第107-199页。

② 叶荣钟著：《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上）》，台北，晨星出版公司，2000年，第118页。

③ 第八章《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吴三连等著：《台湾民族运动史》，第445-490页。